

新概念文学

惊世骇俗

白色花劫

林希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林希/著

白
色
花
劫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色花劫/林希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

ISBN 7-5354-1771-X

I. 白… II. 林…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6104 号

责任编辑:韩 敏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贺 凯

责任印刷: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837121)

印刷者:荆门市印刷包装总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 页:2 印张:11.375

版 次: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217 千字

印 数:1—5000 册

ISBN7-5354-1771-X/I · 1378

定价 14.00 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七月》与《希望》杂志

序言

爲完成大躍進的需要，我們現在將「人民日報」由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日期間所發表的關於抗美援朝的三批社論，即名稱爲「人民日報關於抗美援朝的社論」。在這本社論中，我們仍然印了胡頤的「我的真實談判」一次，作為參考資料。但這篇社論是錯誤的（項雲鈞，不述）把它改爲附錄，印在前面的篇幅「材料」之後。我們在第二編「材料」中修改了一段註文，增加了一段註文，又增補了一段假說。第一、第二兩篇題旨中的「反黨集團」字樣，統稱第三編那幾章，改爲「反革命集團」，以避一律。此外，一切照舊。

恰到頭裏的在這裏，「中國人」，應大大的增加進步。所以桂、一方說：「反革命分子將統治它。」一方面，廣大人民將更加進步。反革命分子和某些反革命懷疑的人們，對於所謂分子的那些迷信和傳言，已經聽厭了。胡楨和胡分子確是一切反革命陰謀、一切反革命分子的代表者，他們已經聽厭了。胡楨和胡分子的所謂所謂和他們的所謂知識，就是一切反革命分子所欣賞，並從這裡得到鼓舞和他們的所謂鬥爭的教育。是不論怎樣，都是無益於他們的滅亡。胡楨分子的這些文件，如同他們的蟲山帝國主義和蒋介石国民党一切反對中國人民的反革命文件一樣，並不是成功的紀錄，而只是失敗的紀録。他們沒有幾次他們自己革命的滅亡。

1955年5月13日、24日、6月10日，《人民日报》分三批刊登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为《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

红鹅同志：

接信。不要多事挂心。应该承受历史的考验。而努力，也确有取潮和未潮的般遭遇。向前需要吗？对于自己，如何扬长而避短呢？与顺于心，就是这样。你可以考究一次。在我没有说，步他之前，你该是明白的话，要坚持以原则，但也不要过度。一定要如此。黑底时回审，你可以把稿子带给我看。祝好！

十一月廿日

1954年12月30日阿垅致林希(侯红鹅)信，彼时运动已渐入高潮。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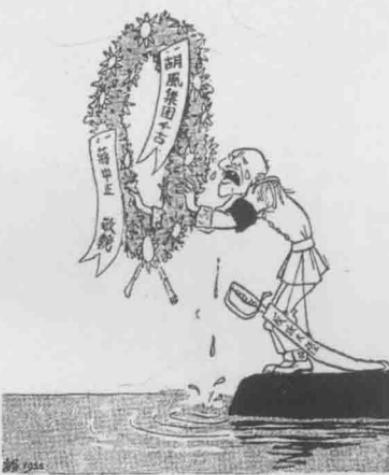
時間結束了

反動本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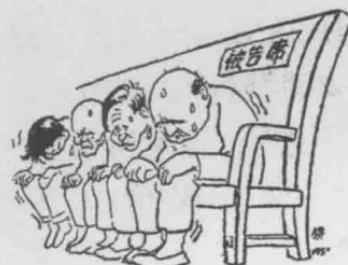


五年「勝利」

(註)胡風寫過一首詩，題曰叫做「時間開始了」。



隔海遙祭



今年到期

“妖魔化”之一班



(左起前排) 贾植芳、贾夫人任敏、冀汎、胡风，(后排) 朱谷怀、路翎夫人余明英、路翎、罗洛，1948年10月在杭州灵隐。



胡风与梅志
1984年于北京寓所



1982年11月，胡风八十寿辰，摄于北京胡风寓所。

(后排左起)绿原、严望、谢韬、鲁煤、卢玉、牛汉、冯白鲁、邹荻帆、李嘉陵、高朗，
(前排左起)徐放、路翎、胡风、梅志、周颖(聂绀弩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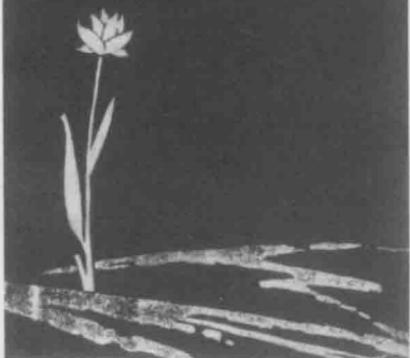


(左起前排)鲁藜、曾卓，
(后排)徐放、杜谷、牛汉、冀汸、绿原、路翎，
1985年1月，参加第四次
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时摄于北京。

1986年1月16日下午参加胡风追悼会的部分同志摄于木樨地寓所。
(左起前排) 谢韬、路翎、徐放、贾植芳、孙郁、梅志、绿原、朱谷怀、罗飞、何满子，
(左起后排) 卢玉、李媛、任敏、杨友梅、耿庸、张禹、华田、欧阳庄、牛汉、鲁煤、化铁、曾卓、冀汸。



白色花



《白色花》



梅志与本书作者合影(张祖道摄)

前　　言

太阳落山了，囚室里也暗了下来。苏格拉底走到牢房门口，坚定地说：“把毒芹汁拿来！”

下毒人走进来，并把一盏灯和毒芹汁同时放在桌上，他麻木地嘱咐苏格拉底说：

“你喝完毒芹汁要来回走走，等你感觉腿脚发沉就躺下。那时毒性即达到心脏。”

苏格拉底泰然地端起碗来，看看碗上清晰的花纹，他笑了，他早就预言过，毒药将放在精美的器皿里给他送来。他的目光随之投向太阳花，心里暗暗向他表示祭酒，然后端起碗来一饮而尽。

囚房里，苏格拉底的床前一动不动地站着向他告别的朋友，苏格拉底的眼睛一直盯着密尔多的花，花冠朝向苏格拉底，在灯光照耀下闪着金光。

朋友们用双手捂着脸，人人失声痛哭。朋友们抬起头来想再看看他死前的面容，但大家突然发现，苏格拉底笑了。

“你还想对我们说什么吗？苏格拉底。”人们轻声地向他询问。

苏格拉底的眼睛没有离开金黄花，他不必多作思考，便回答众人说：

“每个人身上都有太阳——只是要让他发光……”

1986年1月15日上午，胡风同志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隆重举行。筹备追悼大会时，胡风同志夫人梅志亲自主持。她邀请外地的“胡风分子”20人前来参加，主要目的是为他们恢复名誉，加上其余各界人士，梅志所开的名单约有300来人。但在举行追悼的当天，人们从四面八方匆匆赶来，大礼堂里已经站满了五百至六百多人。这其中自然有胡风同志的生前好友，有许许多多胡风案的当事人，但其中更多的人与胡风同志素不相识，甚至和胡风案的任何一个当事人都没有交往。还有许多是在胡风同志等一批革命作家、诗人、理论家蒙冤之后出生的青年，他们中有些人推崇胡风先生的理论，有些人喜爱胡风先生的作品，更有些人敬仰胡风先生的人品，还有的人是出于对一代先驱者的同情。今天他们一齐来了，来到这地处北京西郊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在这样一个寒风凛冽的严冬的早晨，为了向胡风同志表示崇敬。

是的，在雅典罪恶的法庭上，苏格拉底没有为自己辩护，他不需要辩护；而待后人有权利站起来为真理辩护时，真理已不再需要辩护了。

经过反复切磋的悼词终于对胡风同志作出了肯定的评价。由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同志宣读的悼词中说：“胡风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并努力为文艺事业作出贡献的一生。”

肃穆的礼堂里，悲怆的哀乐使人们的心头越发感到沉重，即使是泪水早已在长达二十余年的坎坷生涯中流尽的受难者，此时也仍有晶莹的泪光在眼窝里涌动。这无声的泪水有对死者的怀念，更有对生者的嘱托；一切的灾难与不幸似都终结在这凝重的泪珠里。但透过这泪水，人们还应该看到历

史与现实的深层内涵，否则泪水便会变得苍白；否则，未来也许还会有流泪的日子。

胡风同志的遗像镶嵌着黑纱高悬在墙壁上，他宽宽的前额里曾蕴蓄着那样丰富、深刻的思考，他的目光虽已不似青年时那样睿智，但多年的磨难已使这目光变得越发深邃赤诚。他的面容安详，既没有因自己终于踏过了冤屈而稍显傲岸，更没有因常年的灾祸而烙印上惊恐，他还是那样平易、那样真诚。他就是这样一个赤诚的学者、激情的诗人的胡风，一个作家胡风，更是一个战士的胡风。

站在他的遗像对面，生者的心灵却无法似他那样平静，每一个人在他的遗像面前都有所回忆，也更有所感悟，同时也有所慰藉和激励。胡风，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和政治生活历史中占有特殊位置的人，他本人的经历又何尝不是一代铁血青年向往光明追求真理的经历？他本人悲壮的一生，又何尝不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高扬人格力量、奉献民众解放事业却又要面对着摧残与敌视的悲壮历程？胡风同志以他一生的经历实践了他自己的信仰与发现，他生为一个战士、死更为一个战士；战士的生在于拥抱战斗的人生，战士的死更在于为拥抱战斗人生的后来者开拓一条道路。

按照传统的中国政治生活模式，追悼会的规格标志着死者的社会地位，送花圈和参加追悼会人员中的最高官阶，象征着死者在社会政治结构中的位置，而一篇悼词则又是盖棺论定的最后结论，一片哀荣只体现着政治对人的认定。然而正如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模式早已发生异变一样，许许多多的政治认定远没有成为历史结论，对于许多人来说，死，远不是生命火把的熄灭。人的存在不是由生命限定的，更有超

越生命而存在的人，他们的生命价值需要几代人在生活变革的进程中去深化认识；并非每一个人都如伟人一样地生，也并非每一个人都如伟人一样地死；更何况还有的伟人不允许他人生如伟人、死如伟人。但无情的是，无论是怎样的伟人，也无论是怎样的凡人，每一个人都在死后将自己生命无限的时间和空间留给了后世，后代将按照被生活所印证的真实在这无限的空间和时间里解释他的生命，这时一切缤纷的粉饰都失去了光彩，那么一切遮掩的伪装也将被剥去，能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唯有真诚。

胡风同志的追悼会开得极是隆重，追悼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主持，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和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许多中国文坛泰斗亲自参加了追悼会，其中包括许多过去支持过胡风、帮助过胡风、关心过胡风的人；也有整过胡风、批过胡风而在公正的历史面前又感到了愧疚的善良的人们；至于胡风冤案的许许多多的蒙冤者，能前来参加追悼会的人只有寥寥几十人，大多数同案当事人都散居在全国各地，只能默默地关心着这次追悼会的盖棺定论。

胡风同志的追悼会，系结着全国何止几千人的心灵？胡风冤案殃及全国，直接株连到二千余人，时至今日，这些人一生的功过荣辱都系结着党对胡风同志的最后评价，他们二十余年所蒙受的屈辱，也期待着这次最后的洗刷。应该说明的是，被株连到胡风冤案中来的受害者，并非人人都是胡风同志的朋友，也并非都是诗人、作家，他们并非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集结成了一个“朋党”。这桩冤案因以胡风个人的名字命名，因之它就在事后也仍形成着一种社会误解，似是凡是胡风冤案的受害者必与胡风有某种联系。其实在胡风冤案

二千余人受害者中，认识胡风同志、和胡风同志有过交往的朋友不过只占百分之十几，而大部分因受株连而被定为“分子”或同情分子的人，他们和胡风同志不仅没有任何接触，甚至还有人和所谓的胡风分子从来没有过任何接触，其中有人只是读过胡风的书，有人在笔记本里抄录过七月诗人的作品，还有人竟因自己的朋友在一个晚会上朗诵过七月诗人的作品，而他本人一没有去参加这个晚会，二不知道他的朋友曾朗诵过七月诗人的作品，而最终却因有一个同情分子的朋友而被定为是同情分子的同情分子。

然而就在追悼会后，还是有人在精确地统计、分析着哪些“因胡风而受难的主要人员”来京参加了追悼会，哪些人“恸哭”，哪些人“只有眼泪”；而此外还有哪些著名人士也来参加了追悼会，还有谁身有重病打来电话表示哀悼，还有谁因胡风的“过去事不必再提”而非常激愤，并认为倘若历史重新安排，“周扬和胡风应当是好朋友”。

人们以生命、泪水和圣洁的血为真理奉献的时候，同时也就是日后在为历史作公正的辩护。但胡风冤案毕竟被制造胡风冤案的人将历史的真实涂抹得面目全非，这就难免使日后许多正直的人对历史进行反思时，又常常无法摆脱昔日的思想羁绊。无论是胡风冤案的受害者，也无论是在制造胡风冤案的过程中有过难言之隐的当事人，今天在我们反思历史，从而为了展望中国辉煌未来的时候，首先应该拨开蒙在世人心头上的种种偏见，以严密、科学、公正、真实的心愿将我们大家共同经历过的一切告知世人。尽管我们坚信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但我们有责任向世人解释清楚何以不再重演的历史悲剧还是在历史舞台上神圣而又庄严地演出过，何以一

桩历史悲剧竟要以二十五年的时间和几乎两千人的青春年华、泪水、生命作代价，才能向人们揭示一个本来并不难阐释的生活真实。倘若我们只将这一切描述为一些人悲欢离合的生活故事，也许能得到一些同情的泪水，唤起一些悲怆的叹喟，但唯有深层次的反省才具有真理的重量。

是的，让我们记着一位圣者的话，他说：“后代将会迷惑不解，为什么在如此灿烂的黎明之后，我们还会退化到昔米莱人的黑暗之中。”这位圣者的名字叫卡斯特利奥，他因怀有正义感而惨遭迫害，面对着自命为救世主的天主教统治，他以自己的生命进行无望的斗争，自然他是一个失败者。然而几个世纪之后，在后人重新认识历史的时候，卡斯特利奥无望的斗争才显示出了胜利者的光辉。

人类有幸，历史为了追溯渊源，常常要把事端推向颠狂的极限，这正如唯在洪水泛滥成灾之时，人们才会沿着河道去追寻源头，从而为水流，也为自己未来的生活规划出一个新的设想。胡风冤案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更不是这一些人和另一些人的纠葛和磨擦；胡风冤案远不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高潮，但胡风冤案又必然地结构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动荡之中。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家和文学家将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反思这一桩冤案，其最高目的都在于人类有权利拥有属于自己的春天。

走出追悼会礼堂，许多人的心绪仍非常沉重，尽管人们从党和国家对胡风同志一生所作的高度评价中释却了心头的压抑，也尽管人们因看到中国社会生活终于迎来了明媚的春日而对未来充满信心，但不知为什么，人们总觉得有许多应该说的话还远没有说出来，也还有许多事情要留待历史去逐